

“江南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

【编者按】 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极富特色和颇具影响的文化区域。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江南文化经历了由原始的部族形态到成熟的地域形态、由僻处东南的边缘文化到引领全国的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自身传统的积淀和传承,也有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改造,还有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江南文化源于地域文明而又超越了地域层次,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而又超越了地域意义。江南文化内涵丰富,诸如灵活的地域个性、务实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文化心态、包容的文明意识、开拓的社会精神等,表现出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诸多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江南文化“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趋向,促使其区域社会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学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日显活跃,研究视角和内容也趋于多样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研究江南文化,不能满足于对其历史形态的考察和具体事相的分析,还需要从宏观视角进行理论总结,以便于构建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有鉴于此,本刊约请部分学者就江南文化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希望学界对此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以期共同推动江南学的形成与发展。

略谈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

陈 国 灿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江南文化的讨论相当活跃。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或就江南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地域特征进行历史透视和解读,或就江南文化的有关现象展开具体考察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过,有一点似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江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问题。事实上,江南文化虽不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但濒海而起、依海而兴的历史传统,使之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内陆文化的文明特质和属性,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 灵活变通:江南文化的海洋性格

纵观江南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异常灵活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这固然与江南文化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海洋性格的体现。海洋不仅哺育了江南文明的地域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江南文化的地域性格,使之善于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求,适时调整,灵活应对,从而保持不断发展的活力。

从历史的角度讲,江南文化灵活变通的性格在地域文明的肇始阶段便已有所显现。有关考古发现表明,江南文化源起于典型的农耕文明。早在史前时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就完成了由

原始锄耕和耜耕形态到犁耕形态的演进,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较高水平(范毓周:《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但江南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农耕文明的简单发展和延续,而是伴随着对农耕文明的调整和变通。春秋战国之际,吴、越政权相继在江南崛起。面对诸侯纷争强者胜的时代环境,为了增强国势,两国统治者均采取发展农商的经济政策,强调“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袁康、吴平辑:《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从而突破了“以农为本”的农耕意识,开辟出农商互利的新型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作为江南土著的於越人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用于生产和军事领域,而不是像中原地区那样主要充当象征等级和秩序的礼器,则进一步反映出江南文化不拘传统、灵活变通的品质。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绍兴地区陆续出土的越国青铜器中,只有7件属于礼器,其他均为生产工具和武器(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9、132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时,於越人却将青铜这种珍贵的金属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这种选择典型地反映了於越人在文化品

格和价值取向上与中原汉人甚至楚人不同的特质。”(梁晓燕:《从青铜农具兵器看於越人的文化品格》,《东方博物》2004年第4期)

相对而言,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灵活变通的性格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原华夏文化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并以强势姿态不断将周边文化纳入自身体系之中。秦汉以降,江南地区由所谓“化外”蛮夷之域到“化内”文明之邦的转变,实质就是融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文明体系。表面上看,从西汉中期司马迁笔下“地广人希”、“砦窟偷生”的地域景象,到六朝时期“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三国志·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06页)的社会风尚,江南地区不仅完全被中原文化同化了,而且在北方持续战乱和动荡的环境下,一度成为中原文化的活动中心。但实际上,江南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自主灵活地应对中原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在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地域文化的自我调整和重构,故其向“化内”的转变较其他中原周边区域显得更为快速,也更为平和;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不断改造有着鲜明内陆文明特征的中原文化。于是,原本以清淡和浮虚为特点的玄学走向平实,逐渐与儒、佛融为一体;因烦琐、迷信和脱离实际而趋于消沉的经学转向简约和务实,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活力;门阀士族制度虽形式上仍得以延续,其强调门第等级的核心价值观却在走向解体,南朝历代皇帝无一不出身庶族,便是对士庶有别观念的一种颠覆。可以说,通过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扬弃”和对中原文化的“异化”,江南文化在成功摆脱与华夏“正统”相对应的蛮夷“异端”角色的同时,又在大一统文化体系中确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另类”形态。这种“另类”倾向,随着江南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强化,最终导致中原地区主导大一统文化的格局走向解体。

公元8世纪前期宏伟壮观的“盛唐气象”,展示了处于鼎盛状态的中原文化的自信与浪漫,也预示着中原文化即将面临由其内陆农耕文明本质所决定的发展“瓶颈”。相对而言,江南文化灵活变通的性格使之不仅继续保持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而且实现了向主流文化的全面飞跃。两宋时期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过程的完成,既是

中国传统文明地域发展格局的一种重大调整,更是一场由江南地区所引领的社会变革运动。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宋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说此期中国社会开始由农耕文明时代转向城市文明时代,似值得商榷,但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城市文明的转型,则确是此期社会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直接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品经济的兴盛,冲破了中原文化主导下的传统农耕经济模式;二是“雅俗共体”的市民文艺的活跃,改变了传统文化“雅”、“俗”分离的二元结构(参阅陈国灿:《传统的颠覆:宋代江南市民文化的“雅”与“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2日,第18版)。不仅如此,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引导地位的确立,也引发中国文化整体性格的相应变化。“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民族的特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54页)

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在专制统治日趋僵化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局面;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冲击,江南地区又率先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走在全国各地前列。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江南文化异常灵活的海洋特性,显示出其在不同时代环境下面对各种挑战的极强的适应能力。

二 开放包容:江南文化的海洋心态

整体而言,海洋文明往往较内陆文明更具开放性,对其他文化也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在这种海洋特性的影响下,江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自主开放、兼容并包的地域心态。

不可否认,作为典型内陆文明形态的中原文化也曾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如果说汉唐时期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原文化对域内周边文化的开放包容,那么“丝绸之路”的兴起,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但中原文化的开放包容是以强

烈的“夷夏观”为基础的,是以“天下正统”自居的华夏在充满自信的情况下,对“旁枝末叶”的蛮夷的一种宽容、恩赐和接纳。因此,随着发展活力的逐渐消退,进而丧失原有的优势地位,中原文化便由开放转向封闭,由包容转向排斥。江南文化则不同。作为一种由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海隅蛮夷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其内在意识更多地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不是严格的尊卑贵贱之分,文化交流既不是一方以强势压制和同化另一方,也不是构建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而是彼此自主地开展双向互动。由此出发,江南社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中原文化的强势扩散,通过对中原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吸收、调整而不被中原文化同化的方式,在继续保持自身地域文化个性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江南地区一直走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前列,其中最典型的是宋代和近代两个时期。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首先表现为沿海口岸体系的形成和腹地空间的拓展。虽然江南地区的对外交流口岸在宋代以前就已存在,但数量很少,彼此孤立,而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入宋以后,江南沿海的对外口岸大幅增加,除了杭州(临安)、明州(庆元)、温州、台州、镇江(润州)、江阴、华亭等诸多口岸城市,又有青龙、澈浦、章安、上海、江下、黄姚、顾泾、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萧泾、新塘、薛港、陶港、江湾等一批口岸市镇,由此形成了主导性口岸、辅助性口岸、补充性口岸等多个层次。与之相联系,对外开放的地域空间也由沿海向区域内地扩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广大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带入开放活动之中。其次是开放领域和范围的扩大。一方面,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9页);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外人员往来频繁,彼此交流活动涉及宗教、教育、哲学、文学、音乐、舞蹈、书画、科技等领域。其开放的对象,除了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还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地区。据有关学者统计,有宋一代,与江南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今东亚和东南亚范围的有37个,在今印度及孟

加拉湾沿岸的有26个,在今红海周围及东非沿海的有15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江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主要是由民间力量主导的。规模庞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推动文化开放和政治交往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先后赴高丽贸易的宋商有130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87批次,合计达4955人(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9页)。这当中,有相当部分便属于江南海商。如果考虑到江南海商成员几乎衍括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则不难看出,开放实是整个地域社会的基本心态。与此同时,大批海外人员涌入江南,或经商,或留学,或传教,或游历,有的短暂停留,有的长期定居。南宋学者周密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沙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里所说的“回回”,是指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他们为江南发达的经济和富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所吸引,纷纷前来定居和生活。临安清波门外的聚景园原本是皇家苑囿,到南宋末年已成为回回人的公共墓地。对此,当地官府和民众并未作出激烈的反应,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坦然处之。显然,宋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赵宋政府“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和相对较为宽松的统治方式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江南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具体体现。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态度:一种是坚守固有的文化传统,盲目排外;一种是极力推崇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一种是自主开放,积极应对,以兼容并包的方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效整合。由上海引领的江南社会无疑是秉持第三种应对态度的典范。从中外合璧、艺术交融的建筑文化,到本地沪剧、越剧与国剧京戏和西方话剧、芭蕾舞等百花争妍的舞台文化;从有着浓烈乡土气息的古典吹奏与来自欧美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等交相辉映的音乐艺术,到传统水墨艺术与西洋油画相结合的“海上画派”;从传统酒楼茶馆与西餐馆、咖啡厅并存的饮食文化,到中

西交融的社会礼仪、服饰风尚、婚丧形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风格,充分反映了近代江南文化“灵活开放、汇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与西方文化的有效整合,而且进一步走出国门,开始全面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三 开拓创新:江南文化的海洋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灵活的性格和开放的心态更多地属于江南文化的外部特征。如果我们对江南文化作进一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隐藏在这些特征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海洋精神。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江南文化虽源于农耕文明,但又突破了传统农耕文明的一般模式。如果说春秋中后期崛起于江南的吴、越政权基于王室衰微、诸侯纷争的现实,因地制宜,开拓了农商互利的经济发展道路,由此成功地实现国势的快速提升,加入到大国争霸的行列,那么唐宋之际江南经济的飞跃和变革,某种意义上讲,则属于新的历史环境下,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优势,实现陆海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依托肥沃的水乡平原和便捷的水陆交通,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和活跃的商品市场,推动农商之间由简单的互利关系上升到产业互动的层次。南宋前期颇为活跃的浙东事功学派积极倡导“农商一事”的思想,强调“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二《四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0页),与其说是江南部分社会精英对长期以来历代中原政权顽固坚守“农本商末”观念的一种反动,不如说是他们对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现状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借助地处沿海的自然条件,积极开发海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海洋发生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朝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学者估计,包括江南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1666.6万缗,北宋后期每年进出口总额为2333.4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777.8万缗”(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燕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如此庞大的交易额,意味着对外贸易已成为地域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了部分沿海地区社会的兴衰。南宋

前期,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常州江阴县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就是基于活跃的海外贸易。民国《江阴续志》卷二一引建炎二年(1128年)《复江阴军牒》云:“本县为临江海,商旅船贩浩大,所收税钱过迭常州之数。”同样,曾是“富商巨贾、豪宗右族之所”(陈林:《隆平寺经藏记》,《至元嘉禾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的华亭县青龙镇,到南宋后期已是一片萧条,也是因为江河淤塞,海舶渐稀所致。

从都市文明发展演变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认识江南文化开拓创新的精神。历史上,我国传统都市形态最初是在中原文化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突出特点是强烈的依附性。由于各级城市大多是以政治和军事据点为依托形成的,其首要功能是充当不同层次统治中心的角色,由此沦为专制政权强化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经济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又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发展空间,使之处于农耕文明的附属状态。在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下,江南地区的都市文明在一段时期里也基本遵循了这种“标准”模式。不过,蕴藏在江南社会深层的“异端”意识,决定了其都市文明发展不可能始终走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早在六朝时期,江南城市开始崛起,便已呈现出与中原城市有所不同的发展趋向。“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隋书·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7页)。透过中原文献对当时江南城市发展状况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其商业化的社会特征已初露端倪。在此基础上,晚唐以降,江南地区便承担起城市变革引领者的角色。唐宋之际城市形态的转变,其外在表现是以政治控制为目的的传统坊市制全面解体,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增强,实质是伴随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城市开始真正形成自身的文明体系。就城市社会而言,各种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市民群体意识觉醒的反映,表明市民阶层越来越多地以自主的方式处理社会关系,从而呈现出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就城市经济而言,商业、服务业、手工业、文化业、娱乐业等经济活动的空前兴盛和产业化趋向,意味着市民经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体系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由此确立起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物质文明形态;就城市文化而言,市民文艺的活跃,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

“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而且推动文化重心的进一步下移,走向大众化、世俗化和商业化;就城市观念而言,市民意识不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价值观,也蕴含了平等自主的社会观、追求富裕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但江南都市文明的变革并不只限于城市的转型,还表现为作为新兴都市形态的市镇在广大农村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无论是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空间分布之密集,还是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之高、专业化分工之精细、市场体系之完善,抑或文化之发达、教育之昌盛、社会生活之丰富多彩,都是同期全国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基本完成了由乡村工商业集聚地到新型经济都市的转变(参阅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70页)。市镇的兴起和发展,表面上看是城市活动突破城墙的限制向乡村扩展的结果,实际上更多地属于乡村文明自身内在变革的产物。由于江南乡村经济从来就不是标准的以小农家

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形态,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因而能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独领风骚,走上自主的乡村城市化道路。及到近代,江南地区都市文明的变革依然走在全国各地的最前列。上海迅速崛起,一跃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便是其中的典范。

显然,有人将江南社会开拓创新的传统精神归结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视之为“实用至上”的投机意识,甚至将其与缺乏目标的盲动和不顾一切的蛮干等同起来,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和庸俗的解释。江南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是重视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因时而异,顺势而变,不断进取的价值取向的内化。

收稿日期 2012—09—20

作者陈国灿,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江南文化传统的本体之辨

葛永海

“江南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颇为宽泛的概念,包容性颇强,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不免众说纷纭、泛滥无归。相对而言,江南文化传统因为有具体意义上的指向性,看似更容易达成共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关于江南文化传统的研究,同样一直处于一种众语喧哗、歧义丛出的状态,研究者往往不加分辨,各取所需,最终结果必然偏执一隅,失之全豹。有鉴于此,对于江南文化传统的本体内涵实有细加分辨的必要。这当中,有三个问题尤需要厘清:其一,讨论江南文化传统,应考虑哪些维度?其二,江南文化传统的内核是什么?其三,江南文化不同阶段、不同范围的形态特征应当如何把握?

一 维度之辨

江南文化传统可分为诸多维度,譬如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艺术传统、学术传统、宗教传统等。

在江南文化传承中,一些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词句往往具有鲜明的指示性,烙刻着各类传统的深刻印记。当我们谈到春秋战国之际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自然会联想到江南政治文化传统。当我们说起“东南财赋地”,“苏常熟,天下足”,所指的便是江南经济文化传统。关于江南山水风物的诗句则更是蔚为大观。汉代乐府诗《江南》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唐代白居易《忆江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标示着江南文学绵延不绝的历史脉络。至于名满天下的昆曲、越剧、吴门画派、园林艺术等,属于江南艺术传统的杰出代表。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所指示的乃是江南厚重的学术传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